

沉睡千年的泗洲遗址将打造成为下一个宋韵文化新地标

全球最早的造纸作坊如何重生

本报记者 张 威 李 睿 通讯员 马 丁 共享联盟·富阳 李潇鹏 沈吕诚



“科技国宝”差点和世人擦肩而过

要读懂泗洲,首先要读懂富阳这张纸的分量。

民国《浙江之纸业》记载:“论纸,必论富阳纸”。在手工时代,几乎所有的中国纸都能在富阳找到自己的影子,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。自“皮纸”以始,至竹纸而兴,在宋代时,富阳的手工造纸名扬天下,一句“京都状元富阳纸,十件元书考进士”让“造纸之乡”的名号伴随富阳走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。

但在泗洲遗址发现之前,富阳造纸一直缺少成规模的考古实证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金东告诉记者,国内的造纸遗迹凤毛麟角,此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最早的造纸作坊遗址,是江西高安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,“始于宋代的泗洲遗址,直接把我国有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史往前推进了300多年。”

那么,如此重要的泗洲遗址里究竟有什么?造纸生产线,考古学称之为操作链。看到泗洲遗址的第一眼,你可能会觉得平平无奇:一眼望得到头的“大土坑”中依稀可见沟渠纵横的痕迹,或条形或圆形的“小坑”镶嵌其中,有的被杂草覆盖,有的被塑料布遮蔽着,厚厚一层灰。

参与了泗洲“每一锄头”发掘的杨金东引着我们来到一条东西向的土沟前,用手指比划着告诉我们,在宋代,这就是一条造纸生产线,“以这条水渠为中心,水渠两侧分布着浸泡原料的泔料池、蒸煮原料的皮篁、浆灰水的灰浆池、抄纸房、焙纸房等。”在他的讲解中,一座热气腾腾、人声鼎沸的造纸作坊渐渐在记者的脑海里有了轮廓。

但很多人不知道,当年,泗洲遗址曾差点与我们擦肩而过。2008年富阳高桥镇在320国道

改道工程中,陆续发现了大量遗迹。一开始考古工作队将它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,但是,挖掘出的一条条排水沟、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,让所有人感到疑惑,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?第一阶段清理工作临近结束,答案依然是雾里看花。

所幸,一位村民在现场自言自语了一句:“这很像造纸工坊哎。”

言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考古人员将遗址现场的布局,与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中记载的造纸工艺一比较,又走访了当地的造纸作坊,发现相似度很高。而随后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假设:除了石碾、石臼、石碓等造纸工具外,遗址中还出土了刻有“至道二年”(996年)和“大中祥符二年”(1009年)的纪年铭文砖,这说明泗洲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便作为造纸作坊而存在。

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潘吉星用“科技国宝”四字来评价重见天日的泗洲遗址:“从世界角度看,当富阳造纸作坊在生产的时候,当时的欧洲还处于无纸时代。这么大的作坊,世界罕有。”杨金东的心底还有一个“从1到N”的猜测:目前考古发现至少存在三条相互关联的造纸生产线,“当年这个工坊,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。”

而前不久刚结束的二期试掘成果,似乎也在支撑着他的判断:通过对现有遗址周边的试掘,又新发现约4万平方米遗址,其部分石砌结构与原有1.6万平方米的遗迹较为相似,推测应为同一造纸作坊遗迹。

“加起来一共5.6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,这几乎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工厂的规模了。”杨金东说。

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

泗洲遗址“宋韵文化新地标”的目标定位,让不少人眼前一亮。

“以德寿宫为代表的一系列宋代遗存,大多集中在人文历史政治风貌的领域,而泗洲遗址的独特价值,恰恰在于它是宋代工业技术的典型代表。”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告诉我们,宋代纸的产量与用量都非常之大,并留下了宋版书、宋画等珍贵的文物。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,宋朝在科技领域的成就达到了高峰。可以说,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”

这样的工业气息,有时候微小到只有几厘米——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库房里,就保留着一堆如巧克力饼干似的小土块。

这是当年杨金东从泗洲遗址现场带回来的。当时通过对土壤成分的检测化验,证实了其中有竹纤维。正是这一结果,加速推动了对泗洲遗址“出生年份”的认定——专家一致认为,这是一处宋代竹纸造纸作坊遗址。

“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遗存,大多来自手工业。”深耕手工业技术和文化遗产利用领域多年,苏荣誉一直期望着更多的手工业遗址被发现,从而破解古代手工业的未解之谜。

比如在遗迹西北侧,有一块下宽上窄的石块遗迹,这是一堵保存较为完整的火墙。“两面墙中间空心,在墙中生火,抄好的纸则贴在外侧,隔墙烘干。”苏荣誉说,“这比最早明确记载火墙焙烘纸张技术的《天工开物》,还早了几百年。宋人的智慧及宋代工业的先进性,可见一斑。”

要传承千年前的宋人智慧,不仅要有遗存,更关键的是人。

2008年泗洲遗址被发掘后,富阳竹纸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李文德也去看过,他根据遗址呈现的设备来推测,宋代的工艺流程和他从

小学习的并无本质区别:“如果把遗址恢复出来,我们马上可以将古法工艺都复刻出来。”

2006年,富阳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,也留住了不少李文德这样的“种子”。“至今富阳仍有3个乡镇5个村,上百名匠人守着这门技艺。”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楼高峰说,近几年这些工匠们不断书写着富阳纸的新故事:古籍修复纸、白唐纸、竹檀纸等新纸层出不穷;古法造纸工坊设起了研学体验点,带火了乡村游;崭新落成的元书纸文化展示馆,揭开了“富阳纸”的前世今生;纸制小熊摆件、牛皮纸包包等特色文创产品开始出圈引流……

“泗洲遗址的发现,让我们把这一行干下去的信心守住了。”李文德目前正在申请创建省级非遗工坊,通过“非遗+”拉长产业链,“我相信,这张纸里有春秋,担得起宋韵文化的传承。”



更多想象将在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

泗洲遗址公园的建设时间表已出炉:总体规划面积400余亩,明年开工,预计2025年建成。

一鸣惊人后,泗洲为何沉默了十余年?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,富阳区发改局副局长何荣华列出了一张时间表——2009年泗洲遗址首期考古结束后,被列为富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;2011年列为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;2013年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样的速度,在何荣华看来,已是跑步前进了,“两年一个台阶,足以证明泗洲遗址的价值。”在他的回忆里,其实从2013年起,关于泗洲二期的讨论,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。“关于泗洲的未来,富阳三易其稿。”

第一稿,写满了“保护”两个字。

2013年12月25日,富阳开始在泗洲遗址上,建设保护性钢架大棚。“秉持文物保护优先的原则,起初三三年,我们只是想好好把‘这张纸’保存下来。”参与遗址保护进程变迁的楼高峰说,在当时,造纸博物馆、考古体验馆等周边项目都还处在概念阶段。

2017年1月,大棚竣工。同时,泗洲二期也正式立项。

第二稿的设计,在“保护”后面添上了“发展”。

抛开时代背景来谈保护与发展,都是片面的——彼时的富阳,正处于壮士断腕腾退造纸业的收尾期。2016年以来,富阳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1000余家,光烟窑就“拔”了542根。

但造纸业的未来该何去何从?富阳的“一张纸”如何从制造业属性向文化属性转型?泗洲遗址再次成为焦点。

在楼高峰的书桌边,至今还躺着一本当年的设计方案,“那时候的想法,是围绕保护大棚,做一个还原展示功能为主的遗址馆,遗址公园的占地面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。”

虽然2019年,泗洲二期项目的设计稿获得正式批复,但后续的推进并不算快。越来越多刀刀向内的问题开始出现:泗洲遗址的全貌,到底是怎么样的?现存考古发掘最大的造纸遗址,核心区域只有2400平方米吗?目前的二期项目,担不起得起泗洲的三个“最”字?

这些问题,随着文旅融合的概念逐渐

找到思路。富阳决定,不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,要再做加法。

于是设计规划推倒重来,2020年,第三稿设计开始了。

如今再回望,楼高峰不免感慨,富阳与泗洲,似有一份奇妙的缘分,“没有早一点,没有晚一点,她等了我们千年,恰在此时相遇,刚刚好。”

这个“刚刚好”,来源于2021年下半年,浙江将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提上日程。继德寿宫之后,这片能印证宋代工业技术兴盛的造纸作坊遗址,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契机。

近年来,遗址公园规划进程加快推进,一纸以宋韵为核心的规划设计初步形成:遗址露明保护展示棚、中国造纸博物馆、原乡风貌展示区和农耕文化体验区……更多的想象即将在这片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——

除了已发掘遗址的露明展示区,遗址公园内还将通过地面模拟和数字化复原等方式,呈现出宋代泗洲造纸完整的古法工艺,“类似于目前西安兵马俑的展示方式,发掘与参观实时进行互不相扰,游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的保护工作。”楼高峰介绍说,在另一片研学体验空间里还有沉浸式体验,游客可以亲身体验传统工艺,自己造纸。

不止于此。“博物馆里将建设一个纸基因库。”负责遗址公园设计的浙江省古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师孟超透露,“每一种纸,根据不同时节选用的材料,添加的配料,呈现出的色泽以及质地纹理都是不一样的。”

富阳希望通过对这些纸的统一编码及鉴定,以数字化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归集“纸DNA库”,为今后的书画修复、文物鉴定等工作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和实物支撑。

和泗洲暂别,毛竹、村庄、遗址大棚在我们的视线里往后退去,而时间却在不断前行——从千年前的手工古法造纸,到本世纪潮涨潮落的机制纸,如今的纸乡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纬度中,再次升级了这张纸的文化质感。

而泗洲醒来,就像一位已沉睡千年的老人,正徐徐醒过来。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,向它道一句:你好,好久不见。

被时光湮没的辉煌

宋代的纸业生产单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

第一类是官府经营的造纸作坊。第二类是配民制作官纸。这些固定为官府制造上供纸的生产者称“纸户”,姓名籍于州县官府,由国家提供纸张,可以免除其相应的徭役负担。

第三类是民间商品纸生产。泗洲造纸作坊应该属于第一类。“国营造纸厂”的选址自然是十分讲究的。

首先是水。水是做一张好纸的关键。叶浅予在《富春江游览志》中写道,“其中优劣,半系人工,亦半赖水色”。

泗洲的名字就告诉我们,这里的水系十分发达。两条溪环抱泗洲。一条叫白洋溪,亦叫泗洲溪,光绪《富阳县志》载,“白洋溪发源于东北诸山,曲曲南流三十余里,由范浦入大江”。还有一条叫新义溪,经泗洲并入白洋溪。其次是原材料。富阳是竹纸之乡,最主要的原材料自然是竹子了。“竹纸就是用竹子的整个茎干,经一系列复杂处理后造出来的纸”(《中国造纸技术史稿》)。

南宋陈植在《负暄野录》中也写道:“又吴越竹,以梅天水淋,晾令稍干,反复捶之,使浮茸去尽,筋骨莹澈,是谓春膏,其色如蜡。”

但是,要撑起如此大的一家“国营工厂”,还需要一个广阔的市场。

宋朝的时候,纸的用途非常广泛。《澠水燕谈录》说两浙等地“多造纸纸为衣”。当时的纸衣、纸袄通常为生活贫困者所穿着。诗人陆游就曾吟咏过雪天盖纸被的感觉,“纸被围身度雪天,白于狐腋暖于绵”。纸甚至成为了制造兵器的原料,有纸甲、纸炮等。北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四月,“诏江南、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,给陕西防城弓手”。

当然,在富阳这个县城,最需要用纸的还是每天都要抄写经文的观经庵堂。泗洲附近,恰好宗教场所并不少。除妙庭观和泗洲庵外,东坞山的“九庵十三寺”也是泗洲造纸作坊的重要客户。

真正的大客户在杭州。杭州自五代以来,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。吴越王钱鏐在“天下大乱,豪杰蜂起”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,采取“与其闭门作天子,不如开门为节度”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士归农的策略,换来了“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,四时嬉游,歌舞之声相闻”的大平局面。在当时,杭州已是良工聚集,雕版技术颇负盛名。

北宋时,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,“市易务”等公私刻书也很多。王国维在《两浙古刊本考》中说道:“浙本字体方正,刀法圆润,在宋本中实居首位。宋国子监刻本,若《七经正义》,若史、汉三史,若南北朝七史,若《资治通鉴》,若诸医书,皆下杭州镂版。北宋监本刊于杭者,殆居大半。”

到了南宋,宋高宗“车驾驻临安”,杭州更是成为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中记录杭州的书籍、裱装铺、纸扎铺“自大街及诸坊巷,大小铺席,连门俱是”。杭州刻书行业的发达,自然也带动了周边造纸行业的繁荣。《咸淳临安志》中说道:“按旧志云,余杭由拳村出藤纸,省札用之。富阳有小井纸,赤亭山有赤亭纸。”泗洲距离临安城仅三十多公里,陆运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朝夕至,水运的话就更加方便了,做好的纸张沿白洋溪而下,经范浦,至富春江,再顺流而下,就可以抵达杭州了。

然而,这么大的一个作坊,却伴随着南宋的灭亡,也渐渐湮灭了。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层红烧瓦砾堆积,似乎说明了在宋末元初的时候,这里曾遭遇了一场火灾,作坊毁于一旦。

泗洲造纸作坊消失了,但它所叠加的丰富的历史信息,造纸工艺更迭、发展的生产空间格局关系,成为中国古代造纸术工艺流程的见证,成为中国造纸术伟大发明的最直接证明。(李睿 整理)

